

费孝通的乡土情怀

陈占江

费孝通从14岁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少年》杂志发表文字到95岁辞世前，一直未中断思考与写作。他留下的文字与其说是个人言与思的记录，毋宁说是历史遗产、社会变迁和集体思考交互作用的产物，代表了一代学人为家国命运思虑和民众福祉吁求的心路历程。

从费孝通的人生历程看，他的学术之路颇不平坦，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和1978年之后。1949年之前，费孝通关注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写出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其《江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马林诺斯基所说的是人类学研究文明社会的开拓之作，更在于作者立足本国实际反思西方工业社会是否是世界发展的唯一模式，事实证明乡村工业化道路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和重要力量。1978年之后的费孝通则关注“中国如何富强”这一现实问题，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等名篇，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竭尽心智。他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理论已成为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视角。费孝通晚年不断在“重读”、“反思”，重读过往的著作，不断地对已有研究进行反思，从实求知，在反思的基础上写下了不少对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指引意义的著作。

费孝通的学术旨趣秉承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指向当下的现实问题；其学术路径从来不是思辨式的哲思而是用双脚做学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其学术精神或许从来都不是实证主义奉为圭臬的“价值中立”，而是带有明确的价值取向。通读费孝通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以一贯之的求实、稳健的研究态度。

理解费孝通，如果孤立地从政治或从学术入手，都显然无法真正走进其学术世界和心灵世界。费孝通晚年在自我评价时曾一直反对称其官衔而主张以“先生”呼之。在他心目中，官职只是一种社会职业或职位，是实现抱负的途径，而知识分子才是自己的真正身份。费孝通曾经写过《中国绅士》一书，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皇权和绅权维系的社会秩序，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形成了一对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乡土社会能够在较大的空间内自主运转。其中，绅权便起到了约束的力量。现代国家的建构使皇权和绅权均进入了历史的坟墓，但如何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一个良性的互动状态依然是一个“问题”。

“五四”一代的学者大多属于人格丰满的类型，不仅以学术奉献社会，而且以诗歌寄寓情怀。费孝通的诗歌创作是真性情的流露，他一生留下的诗歌并不多，许多诗歌是在车旅田野间完成的，表达出对人生、对社会、对亲朋的关切与思考。“越山吴水乡土情，桂花时节客来亲。”“古城新貌迎归客，沧桑难变未乡音。”“老来依然一书生，万水千山行重行。”在学者与诗人之间，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费孝通做到了完美的统一。

在笔者看来，费孝通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千万言的著述，毋宁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方法，这种精神就是终身在不断地自我反思和批判，始终将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紧密联系起来，与时俱进而不固步自封，思维永远是活跃的、开放的。